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影响

王智新¹, 刘韩丽²

(1.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2.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 海外投资安全是海外投资绩效提升的重要保障, 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涉外投资领域的重要体现, 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为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 构建中国海外投资安全指标体系并开展测度评价, 探究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影响的作用机制、经济效应与实现路径。结果表明, 近些年, 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发展水平为先升后降, 区域间差异是中国海外投资安全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 国际制裁显著抑制中国海外投资安全, 这一结论经过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依然稳健; 这一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效应, 对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非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更加显著; 国际制裁通过制度环境突变、地缘权力重构、贸易合作受阻三个机制, 抑制中国海外投资安全; 随着东道国金融稳定性不断提高, 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抑制效应不断减弱, 但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这一调节变量则强化这一抑制效应; 随着东道国政治稳定或国家治理的变化, 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门槛效应。研究的结论为维护中国海外投资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和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完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新视角、新思路和新途径, 同时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积极有效化解各类国际制裁风险和挑战, 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 中国海外投资安全; 国际制裁; 总体国家安全观; 反制裁机制; 国家安全体系; 海外投资风险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6)04-0105-12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 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海外投资安全是海外投资绩效提升的重要保障, 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涉外领域的重要体现,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外利益安全, 在顶层设计、机制创新、法治建设和国际协作等方面系统布局, 形成多层次、立体式的海外投资安全治理框架, 有效应对复杂国际形势, 推动海外投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在顶层设计上, 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 均对海外利益保护作出重点部署, 将其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 构建全方位海外投资安全体系。在机制创新上, 建成国家级海外投资风险预警与评估系统, 开通 24 小时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推动涉外企业完善合规与应急响应体系, 整合多部门资源, 提升跨领域风险应对能力。在法治建设上, 推进《海外利益保护法》立法与《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对接 CPTPP、DEPA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国际协作上, 与 30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23 个自贸协定, 深化自贸区网络, 落实 RCEP 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强领事保护协议谈判, 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制定。当前, 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交织, 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 国际规则博弈日趋激烈, 我国海外利益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技术、基建、金融等关键领域投资受到直接冲击, 侵蚀海外投资安全根基。新形势下,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海外投资安全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迫在眉睫。

[收稿日期] 2026-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复杂网络下国际制裁对海外投资的冲击及中国应对研究”(24BGJ035)

[作者简介] 王智新(1981—), 男, 河南南阳人,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从事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刘韩丽(2002—), 女, 宁夏固原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E-mail: 16629075604@163.com。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回答了民族复兴征程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命题,成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海外投资安全是通过系统性风险治理实现发展利益与安全保障相协调的动态高水平安全,核心是构建韧性全球资源配置体系、自主可控产业链生态与可持续国际经济合作格局。这种安全超越传统“防御式安全”,强调在开放合作中对冲风险,既维护海外资产安全与合法权益,也保障关键产业升级、资源通道与国际经济话语权的战略稳定,服务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涉外领域的核心载体。海外投资安全既是维护经济安全、应对国际局势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企业与公民权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加强海外投资安全分析、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能够彰显我国保护海外权益的能力与决心,增强国际信任,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互利共赢筑牢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前地缘冲突与各类安全风险叠加,国际制裁成为威胁我国海外投资安全的首要外部风险,其影响呈现多领域、深层次、全链条的特点。技术层面,美国依托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打压我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产业:2019—2023年国内半导体跨境并购年均额由50亿美元降至15亿美元,降幅达70%,中芯国际14纳米芯片量产也因设备进口受限推迟18个月。基建领域由于受对俄能源制裁连锁影响,我国中亚、东欧油气项目遭遇支付难题,哈萨克斯坦一处50亿美元油气项目融资受阻,延期近两年,直接损失8.7亿美元。金融领域由于在美国“长臂管辖”影响,海外金融机构风控趋严,汇丰银行曾冻结中资企业1.2亿美元项目账户;IMF数据显示,全球18%的中资海外投资项目融资成本上浮3—5个百分点,项目盈利与存续能力受损。可见,国际制裁早已超越传统贸易壁垒,严重制约我国产业链布局、资源保障与国际合作。因此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制裁风险、筑牢海外投资安全屏障,已成为实务界与学界重点关注的前沿问题。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支。第一支聚焦国际制裁,相关研究围绕经济冲击、反制措施与溢出效应三大方向展开。Zhai等证实制裁会对目标国形成显著负面冲击,会扰乱金融秩序、压缩进出口规模,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影响更突出^[1-3]。面对制裁,各国普遍通过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加以应对,贸易伙伴多元化、政策协同与国际合作是主流手段^[4-6],俄罗斯的实践也证明资源禀赋与政策协调能力是抗制裁的核心要素^[7]。此外,制裁还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并产生跨区域连带影响^[8-10]。第二支为海外投资安全研究,现有成果从国家制度、企业管理、技术应用三个维度展开。制度层面,美国不断扩张投资安全审查范围,借国家安全之名限制对华投资,相关法案与新规带有明显政治化倾向,不仅引发全球投资保护主义,也损害自身经济利益^[11-12]。企业管理层面,洪联英等指出我国民企存在股权管控的短板^[13],DeGhetto等则证实风控能力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14]。技术层面,多位学者搭建量化评估模型与分析工具,为投资安全研判提供技术支撑^[15-16]。第三支探究国际制裁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学界形成风险论与机会论两大观点。风险论认为,制裁会抬高投资成本、削弱市场信心,叠加长期制度冲击,持续抑制外资流入^[17-19]。机会论提出,制裁可倒逼企业自主创新、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也有研究认为两者并非对立,制裁效果受制裁强度、经济体韧性等因素的影响^[20],而WTO规则运用、数字人民币等多边以及金融创新,能够有效对冲单边制裁风险^[21]。

已有研究为应对国际制裁风险、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促进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对策建议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视角有待拓展,多集中于经济、金融、政治等领域,忽视全球泛安全化趋势下风险跨领域、跨层级传导的特性,导致研究内涵狭窄、视野局限,难以科学精准应对复杂风险;二是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现有海外投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难以适应全球安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国际制裁影响机理与路径的探讨尚显薄弱;三是对策建议有待完善,现有政策缺乏精准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效支持。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切入,提出三方面创新:首先,在视角层面,提出框架、机制和规则三维创新,从碎片化向全域化整合,强化主动防控机制,推动国际规则塑造,构建我国海外投资全景式安全观;其次,在内容层面,构建“压力—状态—响应—适应—治理”理论框架,完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国际制裁对海外投资的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实现动态评估与精准预警;最后,在策略层面,提出构建多层次国际制裁应对体系、破解制裁传导机制、优化投资布局、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等政策建议,提升海外投资安全治理的系统性、前瞻性和实效性。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海外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战略选择,但受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与多元风险的影响,企业海外投资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海外投资安全本质上是指企业在境外面对多种威胁时,保持可持续安全保障和投资发展的状态,主要通过系统化风险管理机制实现,包括风险预警、危机处置、应急救援等,并结合环境变化与内部需求动态适应,以技术创新与综合治理手段提升应对能力,从而在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增长。国际制裁作为一种非军事手段,旨在通过制度性干预迫使目标行为体改变行为,其实施通过单边或多边形式,对目标国及经济主体带来深远影响。

(一) 国际制裁影响海外投资安全的直接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制裁是国家博弈的重要工具,其通过多维度制度安排与政策干预,对跨境资本、技术配置及市场主体行为形成系统性冲击,是危害海外投资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制裁的影响覆盖投资准入、资产管控、政策预期、技术获取等关键环节,通过制度、金融、政策、市场四维协同作用,形成阻碍海外投资的复合风险屏障。制度层面,国际制裁依托贸易禁运、行业准入限制等制度工具,通过划定投资禁区、限制股权比例、增设严苛合规条件等方式,直接抬高海外投资准入门槛,尤其针对能源、科技等战略行业的投资禁令,直接阻断投资者获取核心资源与市场份额的渠道,使项目初期即面临结构性投资障碍^[22-23]。金融层面,制裁方通过资产冻结、没收、交易限制等手段,直接削弱投资者的海外资产支配、处置与收益权限,引发资产贬值风险。同时,切断目标国与 SWIFT 等国际支付系统的关联,堵塞跨境结算渠道,大幅加剧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22-23]。政策层面,制裁相关的关税调整、许可规则修订等政策频繁变动,打破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预期,大幅增加企业合规成本,迫使投资者调整、搁置甚至退出海外长期投资项目^[24]。其中,出口管制政策的突发收紧,极易造成供应链断裂,导致生产型海外投资项目停滞。市场层面,制裁引发的出口管制阻断了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跨境流动,形成技术转移壁垒,严重制约企业创新活动。对于技术依赖型海外投资项目,不仅会造成研发停滞,还会迫使企业选用高成本、低效率的替代技术,导致原有技术路线失效^[25]。综上,国际制裁从多维度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形成显著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假设 H1: 国际制裁会抑制海外投资安全。

(二) 国际制裁、制度环境突变与海外投资安全

一方面,国际制裁通过多重路径深度重塑东道国制度环境,引发显著的制度突变。在政治领域,国际制裁针对不同政体呈现差异化影响:对霸权国家触发“防御性权力集中”机制,对民主政体则引发“妥协性政策震荡”,多边制裁还会激活信号放大效应,提升政治暴力事件发生概率。在经济层面,制裁冲击致使东道国政策制定逻辑扭曲,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失效,资源配置机制分裂。例如,缅甸军政府采取强制本土化等非市场化工具,造成行业准入规则碎片化^[26]。金融制裁切断朝鲜国际支付通道,引发货币超发与通胀波动^[27]。在法律领域,制裁产生制度层叠效应,使东道国规范体系碎片化、执法标准与实践存在差异性、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律体系的协同性不足等,如伊朗核制裁中条款冲突致外资合同效力悬置,俄罗斯《反制裁法》带来选择性执法陷阱^[28]。

另一方面,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剧烈突变,对海外投资安全构成全方位、系统性威胁。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霸权国家产生系统性征收风险,外资面临关键部门强制国有化威胁。民主政体政策不连续导致投资协议法律效力悬置,政治暴力升级更使外资运营陷入持续性安全危机,传统政治风险评估模型失效。经济政策的畸变让外资陷入“合规悖论”,遵守正式制度将丧失市场机会,适应非正式规则则触发母国法律风险。通胀失控侵蚀投资回报,使盈利预期与安全保障均受挑战。法律秩序的裂变使合同效力不确定,选择性执法导致合规成本剧增,国际法冲突引发仲裁管辖权争议,投资保护机制失效,传统尽职调查也失去预警功能,海外投资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

假设 H2a: 国际制裁通过制度环境突变抑制海外投资安全。

(三) 国际制裁、地缘权力重构与海外投资安全

一方面,国际制裁正深度介入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重塑东道国地缘权力。基于权力转移理论(PTT)与霸权稳定理论(HST)的复合分析框架,守成霸权国通过掌控国际支付系统、金融机构等关键平台,构建起具有强制力的制裁传导体系^[29]。受制裁东道国面临三重压力:政策自主性被制度压缩、区域联盟因外部压力重组、地

缘秩序趋于碎片化^[30]。为应对制裁,东道国往往强化外汇管制、调整外资审查制度,并重新定位外交战略^[31],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资源调配能力与合作关系均发生显著转变。此外,以“通权论”构建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为基础,制裁联盟的“制度嵌套”迫使东道国调整经济政策以规避风险^[30]。依据供应链韧性理论,美欧“友岸外包”战略驱动下的供应链重构也促使东道国改变产业政策与投资环境^[32],进一步重塑其地缘经济权力格局。

另一方面,东道国地缘权力的重构对海外投资安全形成多维度、系统性威胁。在融资层面,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直接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压缩投资利润空间^[29]。在运营层面,“单边绑定”风险加剧,外汇管制收紧导致资金跨境流动受限,外交战略转向影响项目合作稳定性,合规体系复杂化增加交易成本,司法管辖权扩张限制企业经营自主性^[30-31]。在市场准入与长期发展层面,政治化的市场准入审查形成隐性壁垒,技术创新链断裂削弱项目竞争力,使投资面临技术封锁与创新停滞的双重困境^[32]。多重风险相互交织,加之反制机制的缺失,严重威胁海外投资的资金安全、运营可持续性 & 产业升级目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b。

假设 H2b:国际制裁通过地缘权力重构抑制海外投资安全。

(四) 国际制裁、贸易合作受阻与海外投资安全

一方面,国际制裁从多维度冲击贸易合作根基。从目标国策略调整来看,受制裁国家为降低外部依赖会主动重构贸易格局,Smeets 研究发现,制裁压力下目标国会采取报复性贸易策略,将贸易合作重心转向政治互信高、经济互补性强的友好国家,打破原有贸易合作体系的稳定架构。在贸易流通层面,制裁具有双向抑制作用,Doornich 和 Raspotnik 指出,制裁不仅显著缩减了制裁双方的双边贸易流量,还通过贸易壁垒、金融限制等方式阻碍目标国融入全球经济,阻断其国际资源与技术获取渠道,破坏多边贸易合作体系^[33-34]。基于贸易成本视角,Kohl 提出制裁带来的交易管制、运输限制等举措,大幅增加跨境贸易的显性成本与隐性风险,引发供应链断裂、贸易路线瘫痪,加剧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实证数据显示,1989—2016 年美国发起的贸易制裁,使其对目标国进口较非目标国下降 40%、出口下降 30%,金融制裁则造成目标国进口减少 35%。这种成本与风险的失衡,从根本上动摇了双边贸易合作的经济基础,导致贸易合作受阻^[35]。

另一方面,贸易合作受阻会从多维度冲击海外投资安全。经济稳定性层面,贸易停滞弱化市场预期,金融机构信贷收缩易造成企业现金流断裂,同时进出口成本上升、企业利润压缩,导致投资回报率下滑、投资吸引力降低。地缘政治层面,贸易合作受阻会激化地缘矛盾,引发供应链、核心技术与零部件断供,阻碍相关投资项目落地推进,还可能瓦解合作联盟、失效投资保护协定,使投资面临政策变动、权益受损等风险。制度环境层面,贸易受阻会拖累区域制度建设,法律保障缺位会提升投资合规与权益纠纷风险,增加沉没成本,创新合作停滞则制约产业升级,严重损害长期投资价值与安全。综上,贸易合作受阻可通过经济、地缘政治、制度环境三条路径击穿投资安全防线,引发投资安全危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c。

假设 H2c:国际制裁通过贸易合作受阻抑制海外投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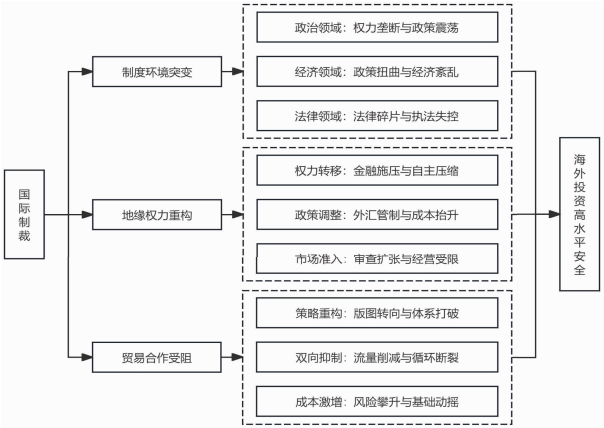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制裁对海外投资安全的作用机理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评估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影响。

$$Saf_{it} = \alpha_0 + \alpha_1 San_{it} + \alpha_2 Control_{it} + \lambda_t + \mu_f + \varepsilon_{it} \tag{1}$$

式(1)中, Saf_{it} 代表*i*年中国在国家*t*的海外投资安全水平; San_{it} 代表国家*t*在*i*年是否遭受制裁,遭受制裁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Control_{it}$ 表示本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λ_t 、 μ_f 分别表示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α_1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二) 指标测算

1. 被解释变量

传统的 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于 1979 年提出,后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环境问题研究的经典框架。该模型提供了“压力—状态—响应”的因果链,直观反映了人类活动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生态系统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便于识别复杂系统的传导过程和作用机制,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资源管理应用、生态环境评价、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然而,传统 PSR 框架存在显著缺陷。其一,传统框架是静态的,没有反映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变化和流动。实际上,框架各环节处于持续的动态演变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每一个步骤都受到多元因素的复杂影响与制约。其二,忽视政策背景、社会态度以及区域经济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层面的外生因素。在响应环节,缺乏对治理有效性的系统评估,难以解释“部分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36]。

鉴于此,本研究对传统 PSR 框架进行改进,引入“适应(Adaptation)”与“治理(Governance)”两个关键维度,创新性构建“压力—状态—响应—适应—治理”理论(Pressure-State-Response-Adaptation-Governance,简称 PSRAG 理论)。本文基于 PSRAG 理论,将海外投资安全细分为压力、状态、响应、适应、治理五大维度,其中压力指政策、经济、社会等外部综合挑战;状态反映投资发展、安全与保障的实时运行情况;响应是供应链、资源调配、危机处置等风险应对举措;适应侧重风险防控与动态调整能力;治理包含政策传导、多方协同、制度创新等多元运行机制。据此构建兼具动态适应性与治理协同性的评价框架,该框架契合国际投资相关安全例外条款^[37]。本文依托该理论创新搭建中国海外投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法开展实证测算。

表 1 我国海外投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算	来源	属性
压力(P)	政策压力水平	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WUI 指数)	Ahir 等	负
	经济压力水平	东道国实际有效货币汇率波动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负
	风险压力水平	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国家政治风险	PRS	负
	社会压力水平	东道国女性弱势群体就业率占所有女性就业人员比例	世界银行 WB	负
状态(S)	投资发展状态	中国对东道国投资占东道国 GDP 比重	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世界银行 WB	正
	投资安全状态	东道国“政治稳定性”,指数区间为(2.5,2.5),分数越高代表该国家制度环境和法治水平越优	世界银行 WGI	正
	投资保障状态	东道国“法治程度”(Rule of Law)	世界银行 WGI	正
响应(R)	港口性能响应	每年集装箱港口吞吐量衡量	UNCTAD	正
	资源依赖响应	东道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HHI 指数),即对华进口额占东道国进口总额的比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UNCTAD	正
	应急投资响应	统计东道国数字通信、医疗应急等技术的专利数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正
适应(A)	人才储备适应	东道国具备 ICT 能力的人才数量:信息和数据素养	国际电信联盟(ITU)	正
	技术创新适应	东道国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	世界银行 WB	正
治理(G)	政府治理能力	东道国政府工作效率	世界银行 WGI	正
	战略治理能力	东道国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议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官网	正
	安全治理能力	公共秩序和安全	UNCTAD 数据库	正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东道国当年)是否遭受国际制裁 San_{it} ,基于全球制裁数据库(GSDB)构建该虚拟变量,数据库由多所海外院校联合开发,收录 1949—2023 年全球单边、多边制裁案例,涵盖贸易、金融、军事等多类制裁形式。在本研究中若东道国在当年内被任一国际组织或主要经济体实施经济、贸易或金融等制裁,则记为 1,未遭受制裁记为 0。

3. 中介变量

制度环境突变:国家脆弱性指数(FSI_{it})。该指数由美国和平基金会联合《外交政策》编制,涵盖社会、经济、政治、安全四大类共 12 项指标,可衡量制度环境突变。政府合法性丧失、公共服务瘫痪、经济失衡、青年失业等内部问题,叠加国际制裁、军事介入等外部干预,都会冲击现有制度,该指数能有效反映这一过程。

地缘权力重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_{it})。由美联储学者构建,依托百年国际媒体报道统计负面地缘事件占比,涵盖战争、恐怖袭击、领土争端、贸易摩擦等事件。指数走高且持续上升,意味着区域原有地缘权力平衡被打破,权力格局迎来重构,同时高风险会拖累经济与市场。

贸易合作受阻:数字贸易规则虚拟变量数据。选取 2009—2023 年 172 国、395 份数字贸易区域协定数据设置虚拟变量,我国与东道国签订相关协定赋值为 0,未签订则为 1。数据跨境、电子认证等规则可降成本、提效率;缺失或规则模糊会限制数据流通,直接阻碍双边数字贸易合作。

4. 调节变量

金融稳定性(*SI*):通过一国银行体系的违约概率进行度量。本文借鉴 Laeven 和 Levine 的研究思路,采用银行 Z 值(*BankZ-score*)评估商业银行的偿付能力与违约风险。具体而言,银行 Z 值越大,意味着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盈利能力越强且收益波动性越低,即银行偿付能力越强,违约风险越小,金融市场越稳定;反之,Z 值越小则表明银行面临的违约风险越高,金融市场越不稳定。

双边制度距离(*ID*):基于 Kogut 和 Singh 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双边制度距离通过衡量政治制度及其实施特征的 6 个核心指标构建^[38]。政治制度及其实施特征的 6 个指标分别是公民权利、政治和社会安定、政府效率、社会监管的质量、法律法规和对腐败的控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5. 门槛变量

本文参考邓富华和胡兵的研究,选取世界治理指数中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两个指标作为门槛变量^[39]。指标原始值范围为 -2.5 ~ 2.5,数值越高制度质量越好。

6.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网络发展水平、经济储蓄能力、国民经济状况、贸易依存度、通胀水平、净国外收入、外资流入、高科技出口、教育投入、资源禀赋等变量,并分别采用对应指标量化,以此控制干扰项,确保实证分析的科学严谨性。

(三)数据来源说明

本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2009—2023 年,研究对象为全球 177 个国家。制裁数据取自全球制裁数据库(GSDB),其他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 2 所示。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当东道国遭受制裁后,中国对其海外投资的安全评分平均下降了 0.0367 个单位,表明国际制裁(*San*)对海外投资安全水平(*Saf*)具有显著的负面抑制影响。这一结论与经典文献一致,Mirkinina 基于 1970—2010 年 184 个国家数据指出,制裁能短期冲击外国直接投资(*FDI*)^[40];Nguyen 和 Ahmed 进一步实证表明制裁显著减少东道国 FDI 流入^[17];Jerg 等通过事件研究法发现制裁的负面影响在实施后的最初几年尤为明显,同时制裁期间及结束后投资环境难以恢复^[41]。特定国家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Huynh 等发现制裁增加了投资不确定性与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Variable	Mean	SD	Min	Max	p50
中国海外投资安全	<i>Saf</i>	0.081	0.063	0.013	0.863	0.086
国际制裁	<i>San</i>	0.632	0.482	0.000	1.000	1.000
贸易依赖程度	<i>Tra</i>	0.903	0.548	0.025	4.426	0.831
物价稳定水平	<i>Inf</i>	0.066	0.198	-0.169	5.572	0.038
经济储蓄能力	<i>Sav</i>	9.588	30.200	-1.036	517.400	1.843
国际收入状况	<i>Inc</i>	-0.086	2.516	-15.030	29.290	-0.059
网络发展水平	<i>Sec</i>	5.970	22.250	0.000	557.200	0.127
国民经济状况	<i>Exp</i>	4.232	16.370	0.002	285.200	0.762
教育资源投入	<i>Edu</i>	4.466	1.654	0.243	15.380	4.381
高科技外向程度	<i>Tech</i>	1.164	3.165	0.000	43.170	0.085
外资吸引能力	<i>Fdi</i>	7.370	53.460	-1300.000	1300.000	2.948
资源禀赋程度	<i>Lnd</i>	14.160	13.300	0.056	61.370	10.620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i>Saf</i>	(2) <i>Saf</i>	(3) <i>Saf</i>	(4) <i>Saf</i>
<i>San</i>	-0.189 *** (0.039)	-0.022 (0.022)	-0.141 *** (0.022)	-0.0367 ** (0.017)
<i>Tra</i>			0.434 *** (0.037)	-0.065 ** (0.031)
<i>Inf</i>			-0.346 *** (0.092)	-0.035 *** (0.012)
<i>Sav</i>			0.005 * (0.003)	0.021 ** (0.010)
<i>Inc</i>			0.069 *** (0.010)	0.055 ** (0.022)
<i>Sec</i>			0.006 *** (0.001)	0.002 *** (0.001)
<i>Exp</i>			0.037 *** (0.007)	-0.013 (0.033)
<i>Edu</i>			0.085 *** (0.006)	0.000 (0.006)
<i>Tech</i>			0.035 *** (0.007)	0.007 (0.008)
<i>Fdi</i>			0.001 ** (0.000)	0.000 (0.000)
<i>Lnd</i>			-0.003 *** (0.001)	0.009 * (0.005)
_cons	0.119 *** (0.025)	-1.034 *** (0.037)	-0.885 *** (0.042)	-1.134 *** (0.082)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度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N	2654	2654	2301	2301
Adj. R ²	0.007	0.902	0.813	0.966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风险,导致企业海外投资更为谨慎,最终抑制投资规模^[42]。现有研究多聚焦制裁对投资发展的显性维度,本文则从“安全”这一创新视角出发,验证制裁对跨国投资安全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支持国际制裁抑制跨国投资的共识,同时揭示其对投资安全的负面影响,从而支持本文核心假设 H1,即东道国遭受国际制裁会降低海外投资安全水平。

(二)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可靠性,本文采用三类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新增地理距离、知识产权使用费两类控制变量;运用因子分析法重新测算对外投资安全指标;剔除 2020 年新冠疫情特殊时期样本。表 4 结果显示,在调整数据处理方式与模型设定后,国际制裁抑制海外投资安全的核心结论依旧稳健,为我国海外投资风险防控与策略优化提供可信理论、数据支撑。

(三) 内生性问题

1. 双向因果问题

本文采用移动份额工具变量(Shift-ShareIV)处理潜在的双向因果问题。工具变量由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和东道国制裁数量的交乘项构成。其中,地理距离属于客观物理属性,具有固定性,能够满足外生性要求;制裁数量则反映东道国在国际制裁中的位置和影响,被视为相关性条件下的重要变量。

表 5 第(1)列和第(2)列为 IV 回归结果,一阶段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F 值 27.839 大于 10、最小特征值 34.102 大于 10% 临界值 16.38,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纳入工具变量后,国际制裁仍显著降低海外投资安全,基准结论不变。

2. 测量误差问题

本文借鉴,运用经典变量误差模型(EIV)确定回归系数,并对测量误差问题进行检验。其结果见表 5 列(3),从中可以看出,其系数为 -0.037,与基本回归系数相差较小,且仍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说明本研究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遗漏变量问题

表 6 报告遗漏变量检验的结果。本文使用模型 $\beta^* = \beta^*(R_{\max}, \delta)$ 来获取真实系数的一致估计,其中 δ 是选择比例性, $R_{\max}$ 是若遗漏变量可被观测时回归方程的最大拟合优度。具体而言,本文进行两个检验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 δ 取值为 -1, $R_{\max}$ 取值为基线结果中调整后 R^2 的 1.3 倍,进而得到 β^* 的值,但是考虑到最大拟合优度 $R_{\max}$ 的合理设定,此处取值为 1,因为 $R_{\max}$ 不能超过 1。其次, β^* 取值为 0, $R_{\max}$ 与检验 1 中取值相同,进而得到 δ 的值。若在第一个检验中 β^* 处于 LCC 的 95% 置信区间内 (-0.0700, -0.0034),且在第二个检验中 δ 大于 1 或小于 -1,则不太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基线结果是稳健的,结果显示 β^* 为 -0.0574,且 δ 为 1.34288,代表不太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

(四) 非对称效应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非对称效应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制裁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海外投资安全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结果见表 7 第(1)列至第(4)列。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受到制裁的负面影响显著, San 的系

表 4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1) 增加控制变量	(2) 改变测算方法	(3) 剔除特殊时期
San	-0.036 ** (0.017)	-0.022 * (0.013)	-0.034 ** (0.017)
$_{-}cons$	-1.157 *** (0.090)	-0.877 *** (0.048)	-1.158 *** (0.0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301	2301	2301
Adj. R ²	0.966	0.942	0.966

表 5 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法		测量误差
	San	Saf	Saf
IV	0.115 *** (0.020)		
San		-0.500 *** (0.170)	-0.037 ** (0.016)
Minimum eigenvalue statistic		34.102 {16.380}	
$_{-}cons$	0.930 *** (0.087)	-0.575 ** (0.224)	-1.134 *** (0.0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301	2301	2301
Adj. R ²	0.769	0.957	0.969

注:大括号内数值为弱工具变量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 6 遗漏变量检验

	Standard	Estimated value
(1) $\beta^*(R_{\max}, \delta) \in [-0.0699774, -0.0033861]$		$\beta^*(R_{\max}, \delta) = -0.05739$
(2) $\delta > 1 \text{ or } \delta < -1$		$\delta = 1.34288$

数为-0.069。这类国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制裁会冲击产业布局、阻碍贸易与资金流动,进而降低海外投资安全性。中高收入国家 *San* 的系数为 0.015,结果不显著,说明制裁未对其海外投资安全形成明显冲击,其经济韧性强、产业结构多元,可通过结构调整、开拓新市场对制裁影响。中低收入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显著,*San* 的系数为-0.043。制裁加大了其获取资金、技术与市场的难度,制约海外投资开展。低收入国家 *San* 的系数为-0.041,但结果不显著,大概率源于样本量偏小($N=338$)造成估计偏差;同时这类国家海外投资集中于资源开发等领域,叠加自身国际影响力较弱,制裁的负面作用在数据中未体现出显著性。

2. 地缘战略地位非对称效应

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影响存在地缘战略异质性。表 7 第(5)列和第(6)列结果表明,国际制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安全的负向影响显著但程度较弱,对非沿线国家的负面冲击则更为突出。杨竺松等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升参与国治理水平,有效缓冲制裁带来的冲击、弱化其负面影响;非沿线国家缺少相应的治理优化与协同机制,制裁的破坏作用更为直接^[43]。这一差异体现了地缘战略关系的干预效果,沿线国家依托紧密的战略协作与利益联结,投资安全韧性更强,非沿线国家则更易受制裁影响而出现投资安全波动。

六、作用机制和调节效应检验

(一)作用机制检验

为深入剖析国际制裁的作用路径,本节以东道国制裁强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开展实证检验。表 8 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制裁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可使东道国国家脆弱性指数提升 0.095,说明国际制裁会恶化东道国经济与政治环境,破坏其制度稳定性。Tan 采用两阶段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成果佐证了这一结论,其研究指出经济制裁会引发民众经济困境与政府不满情绪,激化政治动员问题,显著削弱东道国政治稳定性,且制裁对民主国家政治体系的冲击更大,核心原因在于专制政权可通过镇压手段压制公众异议,大幅提升民众反对成本^[44]。同时,国际制裁对东道国地缘权力脆弱性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001,表明制裁会显著推高东道国的地缘政治风险。针对多边合作机制,鉴于对应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开展计量分析,表 8 第(3)列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国际制裁会使东道国不签订数字贸易规则的概率平均提升 3.42%,证实国际制裁会显著阻碍数字贸易规则落地,制约双边及多边贸易合作开展。由此,验证假说 H2 得到检验。

(二)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探究金融稳定性(*SI*)与双边制度距离(*ID*)在国际制裁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安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稳定性能够显著削弱制裁的负面冲击:制裁会扰乱东道国贸易与资本流动,如果当地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则制裁易引发资金乱象、拉低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抬升投融资风险;如果金融体系稳健,则可有效缓冲冲击、维持投资效率并稳定市场信心。表 9 第(1)列和第(2)列结果显示,两者交互项的系数为 0.004,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印证了缓解作用,表 9 第(3)列和第(4)列中制度距离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上述放大效应。王碧珩和高恺琳关于制度距离拖累海外子公司绩效的研究也为本结论提供了支撑^[46]。

表 7 异质性检验

	经济发展水平				地缘战略地位	
	(1) 高收入 <i>Saf</i>	(2) 中高收入 <i>Saf</i>	(3) 中低收入 <i>Saf</i>	(4) 低收入 <i>Saf</i>	(5) “一带一路” <i>Saf</i>	(6) 非“一带一路” <i>Saf</i>
<i>San</i>	-0.069 * (0.040)	0.015 (0.034)	-0.043 * (0.025)	-0.041 (0.039)	-0.031 (0.021)	-0.042 * (0.0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0.144 (0.160)	-0.751 *** (0.164)	-0.518 *** (0.093)	-0.873 *** (0.176)	-0.892 *** (0.135)	-1.254 *** (0.088)
N	741	585	624	338	1747	907
Adj. R ²	0.976	0.835	0.811	0.840	0.959	0.974

表 8 中介机制检验

	(1) 制度环境突变	(2) 地缘权力重构	(3) 贸易合作受阻
	(1)	(2)	(3)
<i>San</i>	0.095 *** (0.015)	0.001 *** (0.001)	0.034 * [0.074]
_cons	102.303 *** (1.342)	0.075 ** (0.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N	2143	2301	2301
Adj. R ²	0.983	0.755	0.094

注:中括号内为 P 值。

(三) 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 TRM 模型,选取东道国政治稳定、国家治理两大制度质量指标作为门槛变量,探究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门槛效应。政治稳定决定东道国整体风险环境,政治失稳会加剧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冲击程度随当地政治稳定水平呈现差异。国家治理能力是抵御制裁风险的关键,治理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可依托行政与法治优势化解风险、保障外资权益;治理薄弱地区则易滋生各类乱象,推高投资成本、阻碍项目开展。表 10 展示了两个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表 11 显示,国际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其中以政治稳定(*pv*)为门槛变量,当 *pv* 低于 -1.4303 时,国际制裁显著抑制海外投资安全,效应系数为 -0.771;当 *pv* 处于 -1.4303 至 0.0152 区间时,抑制作用减弱,系数为 -0.317;当 *pv* 高于 0.0152 时,影响效应转为 0.293,制裁对投资安全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整体呈现“强抑制 - 弱抑制 - 促进”的动态转变。以国家治理(*ge*)为门槛变量同样存在阶段性差异,当 *ge* 低于 -0.7520 时,制裁显著抑制了投资安全,系数为 -0.554;当 *ge* 处于 -0.7520 至 0.6501 区间时,抑制作用小幅弱化,系数为 -0.145;当 *ge* 高于 0.6501 时,效应系数为 0.343,制裁转为促进作用,整体表现为“抑制 - 抑制缓解 - 促进”的非线性门槛特征。

(四) 空间杜宾(SDM)模型空间检验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动荡,单边制裁、长臂管辖愈发普遍复杂。我国海外投资覆盖范围广,易遭受制裁带来的跨区域、跨行业间接冲击,且该影响具备明显空间关联特征。仅针对单一国家或事件开展分析存在局限性,因此有必要从空间视角展开研究。检验国际制裁的空间溢出效应,既是应对地缘风险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我国海外投资稳健发展、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

1. 空间溢出模型回归分析

(1) 空间回归模型的识别与选择

本文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选择之前,利用莫兰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空间权重矩阵下,2009—2023 年投资安全水平的 Global Moran' I_i 指数大部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投资安全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满足空间计量条件。参照杜之利等的做法,本文选择双重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47]。

(2) 空间杜宾(SDM)模型空间分解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 12,东道国国际制裁(*San*)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呈显著负向影响,直接效应为 -0.023(10% 显著性水平);空间滞后项($W \times San$)对应的间接效应为 -0.136(10% 显著性水平),风险会向邻近区域传导;总效应为 -0.159,整体负面影响显著。究其原因,制裁引发局势动荡,借助情绪、信息传播形成安全风险连锁溢出。已有文献证实制裁存在明显溢出效应,其会加剧金融波动、推升滞胀风险、重构供应链与贸易格局,还可能对第三方主体产生异质性

表 9 调节机制检验

	(1)	(2)	(3)	(4)
	<i>Saf</i>	<i>Saf</i>	<i>Saf</i>	<i>Saf</i>
<i>San</i>	-0.029 *	-0.036 **	-0.037 **	-0.053 ***
	(0.018)	(0.018)	(0.017)	(0.017)
<i>SI</i>	0.002 *	0.002 *		
	(0.001)	(0.001)		
<i>San × SI</i>		0.004 ***		
		(0.001)		
<i>ID</i>			-0.067 ***	-0.069 ***
			(0.016)	(0.015)
<i>San × ID</i>				-0.053 ***
				(0.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_cons	-1.300 ***	-1.296 ***	-0.990 ***	-0.961 ***
	(0.069)	(0.069)	(0.088)	(0.089)
N	2112	2112	2262	2262
Adj. R ²	0.974	0.974	0.967	0.967

表 10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模型	F 统计值	p 值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政治稳定	单一门槛	699.670	0.000	122.365	116.394	109.826
	双重门槛	162.030	0.000	36.046	31.141	29.312
国家治理	单一门槛	353.440	0.000	111.368	105.523	101.972
	双重门槛	174.600	0.000	33.500	30.299	27.110

表 11 制度质量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门槛值	(1) 政治稳定	(3) 国家治理
$pv \leq -1.4303$	-0.771 *** (0.031)	
$-1.4303 < pv \leq 0.0152$	-0.317 *** (0.021)	
$pv < 0.0152$	0.293 *** (0.021)	
$ge \leq -0.7520$		-0.554 *** (0.036)
$-0.7520 < ge \leq 0.6501$		-0.145 *** (0.016)
$ge < 0.6501$		0.343 *** (0.021)
_cons	-0.555 *** (0.040)	-0.599 *** (0.038)
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N	2301	2301
Adj. R ²	0.87	0.853

影响^[48-51]。本文区别于既有研究,聚焦海外投资安全维度,证实制裁不仅会削弱我国在受制裁国的投资安全,还会通过空间关联向周边区域传导风险。

2. 空间门槛(SDM-TRM)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 SDM-TRM 模型探究国际制裁对周边投资安全的空间门槛效应,结果如表 13 所示。直接效应受政治稳定阈值影响较小,而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当东道国政治稳定度较低($pv < -0.0658$)时,间接效应系数为 0.084,当地固有不稳定因素与市场适应性预期抵消了制裁冲击,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当东道国政治稳定度较高($pv \geq -0.0658$)时,间接效应系数为 -0.376 且显著,这类区域经贸关联紧密,制裁引发的信任危机与市场波动会快速传导,显著降低周边投资安全水平。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海外投资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构成,海外投资安全既是提升海外投资绩效的关键保障,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外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稳健推进的重要基础。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本文构建中国海外投资安全指标体系,系统测度其发展水平,并深入剖析国际制裁影响海外投资安全的作用机制、经济效应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海外投资安全水平时序上先升后降,区域差异是整体差距主因;国际制裁显著压制海外投资安全,负面效应在高收入、中低收入及非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更强。制裁通过制度突变、地缘重构、贸易受阻三条路径冲击投资安全;东道国金融稳定可缓解该负面影响,双边制度距离则会加剧冲击。同时制裁的抑制作用存在门槛、空间溢出与空间门槛特征。本文研究结论可为维护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统筹海外利益保护、完善国家安全机制、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也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化解国际制裁风险、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提供了实证支撑与政策启示。

(二) 政策建议

在百年变局加速、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海外投资是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际制裁作为大国博弈的关键手段,会从制度、地缘、规则多维度冲击全球产业链秩序与我国海外投资安全。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需构建前瞻性、系统化的海外投资安全治理体系,主动防范外部风险、维护国家利益、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具体对策如下:一是搭建多层次制裁风险应对体系。统筹外交、商务、金融等部门建立智能化风险预警应对机制,依托大数据动态监测制裁风险、提前优化投资布局;积极参与多边合作,联动发展中国家抵制单边制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公平化。同时推出政策性“制裁险”,通过政府补贴、机构参保、多边共保模式赋能企业抗风险能力,并以“投资+援助+贸易”模式优化东道国发展环境,降低制度不稳定引发的制裁传导风险。二是精准破解制裁传导路径。设立海外制度合作专项基金,助力东道国完善法治与监管体系,深化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合作,对冲制度突变风险;出台国家脆弱性评估规范,将制裁风险纳入投资前置评估,优化投资决策。主动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依托“一带一路”推进区域投资规则体系建设,消解规则冲突、强化区域治理协同。三是推行差异化投资布局与准入管理。结合东道国制度、经济特征,依据“风险-收益”矩阵精准布局投资,在高制度质量国家开展高端产业技术合作,在低脆弱性国家布局能源、民生等重点项目,规避制裁高发风险。设立政治稳定、治理水平等量化投资准入标准,对治理潜力较强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待其制度环境优化后稳步扩大投资规模。四是健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抵御制裁溢出风险。依托各类区域合作平台,搭建制裁信息共享与政策协调机制,联合周边国家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防范制裁引发的资本波动与供应链风险。持续优化全球

表 12 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

空间权重矩阵			
San	-0.025 *	-0.013	0.057
W × San	-0.207 **	-0.101	0.039
直接效应	-0.023 *	-0.013	0.086
间接效应	-0.136 *	-0.076	0.073
总效应	-0.159 **	-0.075	0.035
Fix	是		
控制变量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N	2197		

表 13 空间门槛回归结果

	Saf	系数	标准误	p 统计量
Spatial:	η	-0.293 **	0.123	0.017
直接效应	$pv < -0.0658$	0.275 ***	0.014	0.000
	$pv \geq -0.0658$	0.308 ***	0.023	0.000
间接效应	$pv < -0.0658$	0.084	0.078	0.282
	$pv \geq -0.0658$	-0.376 **	0.155	0.015
Fix	是			
控制变量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N	2197			

投资布局,向西向、南向“一带一路”沿线延伸投资,强化企业本地化运营能力,同时在成熟市场深耕高新技术与关键产业合作,掌握产业链供应链主动权。五是强化制度韧性建设,筑牢长期安全根基。深化双边制度合作,助力东道国提升治理能力,降低制度不确定性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谈判与国际经济治理,提升我国规则话语权,推动构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为我国企业营造公平稳定的海外经营环境。

参考文献:

- [1] Zhai Y, He W, Zhao X, et al. Does economic sanctions bring risk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5, 86(8): 812-825.
- [2] 王珊珊,高自旺. 经济制裁与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来自跨境股票资本投资的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3): 45-62.
- [3] 窦超,等. 制裁冲击与企业风险:基于美国对华单边管制清单的研究[J]. *金融评论*, 2024(4): 78-96.
- [4] 刘军梅. 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J]. *俄罗斯研究*, 2022(2): 67-94.
- [5] 熊启跃,王宁远. 俄乌冲突与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特征、影响与启示[J]. *俄罗斯研究*, 2024(4): 35-61.
- [6] 宋爽,吕静,熊爱宗. 金融制裁是否会削弱美元霸权?——一个基于储备安全成本的分析框架[J]. *当代亚太*, 2025(1): 32-60+170.
- [7] Wu X, Zhang D, Sun Y. The collateral damage of U. S. san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peer firms during the trade war[J]. *Economic Modelling*, 2026, 157(1): 107512.
- [8] 郑联盛. 美国金融制裁:框架、清单、模式与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 2020(3): 123-143.
- [9] 李巍,穆睿彤. 俄乌冲突下的西方对俄经济制裁[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4): 53-69.
- [10] 李旭. 经济制裁的诞生与国际法秩序的重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封锁与禁运品管制规则演变为切入[J]. *开放时代*, 2024(5): 112-130.
- [11] 沈伟,陈徐安黎. 美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的歧视性适用及国际法约束[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2): 97-108.
- [12] 刘露馨. 美国投资安全审查中的非正式治理[J]. *国际经济评论*, 2024(5): 78-104.
- [13] 洪联英,张玉珍,吴雨奇,等. 全球政策不确定性、组织控制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安全[J]. *世界经济研究*, 2022(9): 34-48.
- [14] DeGhetto K, Lamont T B, Holmes M R. Safety risk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ecision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20, 55(6): 101129.
- [15] Yuyang Z. Analysis of Benefits and Security of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J]. *Appl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3, 37(1): 2219562.
- [16] Apatova N, Burkaltseva D, Vorobyova E, et al. Assessment of the level of region investment securit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Techniques*, 2020, 8(4): 1468-1479.
- [17] Nguyen L Q T, Ahmed R.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lobal data[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2023, 25(1): 79-99.
- [18] 徐昕,吴金昌. 单边经济制裁引发国际投资争端的路径、挑战及中国应对[J]. *国际经济评论*, 2024(5): 105-126.
- [19] 郝晨晨. 制裁背景下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调整[J]. *现代国际关系*, 2025(2): 26-46.
- [20] 陈放,苗品良. 美国对俄罗斯跨境支付体系的制裁及其启示[J]. *当代美国评论*, 2023, 7(4): 23-43.
- [21] 许文鸿. 美欧对俄货币制裁及人民币国际化在俄罗斯的新发展[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3(5): 17-38.
- [22] 陈尧,杨枝煌. SWIFT 系统、美国金融霸权与中国应对[J]. *国际经济合作*, 2021(2): 82-96.
- [23] Marco C, S. L G, Gabriele S L. Financial sanctions, SWIFT,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 system[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3, 37(1): 31-52.
- [24] Carpentier C, Cumming D, Suret J. The value of capital market regulation: IPOs versus reverse mergers[J].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2012, 9(1): 56-91.
- [25] 郝威亚,魏玮,温军,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实物期权理论作用机制的视角[J]. *经济管理*, 2016(10): 40-54.
- [26] 周晶晶,赵增耀.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9): 147-160.
- [27] Thi Q L N, Rizwan 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lobal data[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2023, 25(1): 79-99.
- [28] Shuo F, Wei S. Calvo is back! Changing sovereignty and evolutionary investment law in a leaving and return of the state paradigm[J].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20, 13(2): 307-335.
- [29] 张颖,刘晓星,柴璐莹,等. 金融制裁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基于全球金融制裁数据的实证分析(1945-2017)[J]. *金融论坛*, 2020(1): 49-57.
- [30] 李振福,邓昭. “通权论”:新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J]. *学术探索*, 2021(12): 40-50.
- [31] 陶士贵,高源. 西方经济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11): 113-126.
- [32] 刘洪钟. 地缘政治经济视角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4(2): 48-67.
- [33] 李燕,张广浩. 全球最低税、税收协定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J]. *税务与经济*, 2025(3): 1-12.
- [34] Borge J D, Andreas R. Economic sanctions dis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 trade dynamics: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sanctions on Russia[J].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2020, 26(4): 344-364.
- [35] 李玉娟,任雪姣,郑宇轩. 非常控股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5(1): 45-56.
- [36] 马小宾,章锦河,郭丽佳,等. 生态环境研究中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应用的陷阱与改善[J]. *生态学报*, 2024(12): 4923-4932.

- [37] 黄世席.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国家安全条款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5.
- [38]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 [39] 邓富华, 胡兵. 制度约束下东道国腐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检验[J]. *中国经济问题*, 2013(4): 99–108.
- [40] Mirkina I. FDI and sanc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hort-and long-run effect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54(1): 198–225.
- [41] Jerg G, Matthias N, Florian 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 event stud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3, 51(4): 1214–1231.
- [42] Duong T K, Huynh T D L, Phan B D A, et al. From Russia with love: International risk-sharing, sanctions, and firm investments[J]. *Economics Letters*, 2024, 244: 112005.
- [43] 杨竺松, 陈冲, 杨靖溪.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国家治理[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3): 4–29.
- [44] Tan D. The causal effe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A two-stag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25, 34(1): 105–119.
- [45] 范晓宇, 漆彤. 经济制裁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影响——基于 ISDS 实践的分析[J]. *国际法研究*, 2022(5): 69–86.
- [46] 王碧琨, 高恺琳. 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8): 111–130.
- [47] 杜之利, 苏彤, 葛佳敏, 等. 碳中和背景下的森林碳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 *经济研究*, 2021(12): 187–202.
- [48] 郭文伟, 罗胜涛. 关联网络视角下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空间溢出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24(12): 14–28.
- [49] 谭小芬, 王欣康. 经济制裁的全球溢出效应——来自俄乌冲突的证据[J]. *经济管理学报*, 2023(3): 233–270.
- [50] Bista R, Sheridan B. Economic sanctions and export marg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5, 33(2): 423–435.
- [51] Kwon O, Syropoulos C, Yotov V Y. Identifying and quantify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 of sanction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4, 170(1): 104888.

[责任编辑:杨志辉]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under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ANG Zhixin¹, LIU Hanl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security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s a crucial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its performance,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 fundamental foundation for China's path to stable and sustainabl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or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and conduc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economic effects, and pathways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level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has first risen and then declined, with regional differences being the main source of the overall gap in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significantly suppress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after testing and addressing endogeneity issues; this inhibitory effect exhibits heterogeneity, being more pronounced for high-income countries, middl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and non-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suppress the security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s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abrupt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reshaping of geopolitical power, and obstruction of trade cooperation. As host countries' financial stability improve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weakens, but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host countries and China intensifies this effect. With changes in host countries' political stability or stat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exhibit clear threshold effec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spatial threshold effects on the suppress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The paper's conclusions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ideas, and approaches for maintai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s, coordin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safeguard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It also offer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mitigating various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risk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mproving anti-sanction, anti-interference, and anti-“long-arm jurisdiction” mechanisms, and resolut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Key Words: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anti-sanction mechanism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overseas investment risks